

元魏石窟文文学意识与美学特点

贺玉萍

(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石窟造像碑刻题记的研究,向来属于金石学与历史学范畴,对其作为实用文体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少有论及,对其文学研究几为空白。元魏石窟碑记文由于其产生的时代所致,具有其特殊的文学魅力,从文学意识、审美特性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元魏 石窟文 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09)05-0124-03

一、元魏石窟文的文学意识

以迁都洛阳为界限,北魏石窟文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平城拓跋魏时期为发展、积累阶段,那时的碑记比较简单,还没形成独立的文体。据统计,云冈石窟碑记文只有32种,45题^[1],皆粗具梗概。洛阳元魏时期,是石窟文得到极大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的成熟期。一是篇幅越来越长,有的甚至超过一般的诏书类应用文章。如《水泉石窟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西沃石窟造像记》、《皇甫度造像记》等,篇幅多达数百字,最长的竟有一千多字。二是形成了成熟的风格。三是写作人数众多,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全面展示了整个社会的情态。我们之所以提出石窟文的文学意识这一问题,就在于元魏石窟文是有意为文,因时而作,为事而作,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大众的普遍心理。

(一)宗教情绪主导下的人生真情的表露

1.真实心灵的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温顺敦厚,含蓄委婉,在思想表现上往往以物言志,借物传声,欲说还休。但在石窟文中,一反传统,造像者把永不示人的真情毫无障碍地表露出来,直接显露内心真实的、正统观念羞于启齿的诸如求官、求财、求命等欲望,甚至暴露出如妇女想托生男人、感激怀孕等比较隐秘的意愿。从创作动机论,佛教是最忽视群体意识而注重个体修养的一种宗教,它所倡导的度脱方式以及实现大极乐的方式都是以个体修炼为前提的,一切“功德”均是通过个体意识自觉来实现的。这种规定性和思维方式传导在石窟文上,表现的是以个体自我对群体的反映与感受。所有的造像者在巨大的宗教精神控制下,完全匍匐在佛陀脚下,袒露出赤裸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欲望,表现了一种急于解脱的、寻求大自

由的焦虑情绪。

2.“幽隐”感觉的描写。佛教强调自觉,通过“悟”来实现自我的超越。因此,它十分注重意识的细微流动与微妙变化,力求用空相观念解释现实中的一切。在文中,多表现出幽隐、玄虚感觉,特别是在描写心理活动中,把个体对外界的特殊反映、特殊感觉、不可捉摸的意识片段,表现得极为深刻而淋漓尽致。我们之所以讲是幽隐,在于它是人们心理意识的最深层,有时候是下意识的,或者是潜意识流的。这种描写非常真实也非常珍贵,对后代文学手法心理刻画起到了先导作用。如“芒芒玄极,眇眇幽宗,灵风潜被,神化冥通”^[2]这种幽隐特征,在此前一些文化中很难找到踪迹,这是特殊文化下的宗教情绪。再如“夫水尽则影亡,谷盈则响灭”^[3]、“水净与影无”^[4]、“谷盈与则响灭”^[5],是极端空暗的体会。“灵光弗曜,大千怀永夜之悲;玄踪不邁,叶生含靡道之怀”^[6]则是极细微、极细腻的感觉。

(二)对现实沉重之反映

石窟文具有为时而作、为事而作的精神。给人最强烈的感受是浓郁的为逝者而悲、以生者为苦的悲苦之情,透露出时代的焦虑与无望。

1.对生命短暂的担忧。一方面,身命难保,激起人们对生命的留恋,常常表现出对生活的眷恋,对生命的珍惜,对美的向善与憧憬。另一方面,佛教给人生以新的诠释,重来生现世,认为人生为苦的思想既与魏晋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观念发生了矛盾,也与传统乐生、重生和长生理念大相径庭,使人们思想深处发生尖锐矛盾,在群体思想上也表现出犹豫与留恋、解脱与迷惘的踌躇与彷徨,这种矛盾意识交织在一起,使石窟

收稿日期 2009-05-20

作者简介:贺玉萍(1964—),女,山东莱阳人,洛阳理工学院副教授。

文表现得一唱三叹。

2.对灵魂的担忧。石窟造像很大部分是为追荐亡者而建的功德,无不流露出对生命结束的深深恐惧。与前期同类话题相比,人们对死亡的描述,对死亡意识的敏感度,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深刻的心理体验和沉重的思想折磨。死亡,已不仅仅是无奈和痛苦,更多是宗教强加给灵魂不得超度、不得安息的负担。这种负担更让生者极端忧惧,食不甘味,痛不欲生。我们把它与曹魏时期的同类题材进行对比,曹魏时,人们对生命意识的体验主要表现为因“生命如朝露”的短促而惋惜、而悲悼、而秉烛夜游,未能感觉到灵魂的苦痛。而石窟文,触目皆是“有形之类”、“三途之恶”、“地狱休息”、“饿鬼解脱”、“五苦诸恶”等语言,由此可见,佛教描绘的幽暗、森惧、痛苦如同枷锁,勾魂摄魄般深入人们思想当中,让人的灵魂陷入不可解脱的深渊。这种恐惧是前所未有的体验,比单纯的生命意识更为可怖。正是这种恐怖的体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大众心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于是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所以人们希望的是,“愿亡夫、亡女、二邑,五苦速令解脱”,“亡者离苦得乐,普津法界”,“愿登紫极永与苦别”,“托生西方妙乐国土,值佛闻法”等^[2]。这是劫后余生的集体情感,是芸芸众生的同声祈告。

3.对平安的担忧。佛教以人生为苦,于人的精神影响是沉重的。以至于我们在石窟文中很难找到魏晋文学“欢乐生命”与“及时行乐”的影子,反而更多感受到沉滞凝重与郁郁寡欢。即便是阅读词句优美的碑文,也少有会心的喜悦。这种情感,是发愿者无法说、不敢说的情愫超导给我们的感觉,是对生命中诸多忌讳、顾忌而借助另外一种语言所表现出恍惚、怪诞的焦虑。比如石窟文中有相当一部分为现实发愿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虚幻、玄远,甚至不切实际,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但却是那时代真挚之情。“愿此善资离苦得乐”;“愿夫主高□帝王宠念,又愿己身、亡息、征孙□任所生者,使□子平康,圣贤佑助,家眷安宁,命齐天等,行来□□一切从愿”;“永愿母子长餐化年,眷属内外终始荣期”^[2]。这里面,有求福的、求官的、求食的、求安的,不一而足。统而言之,人们对自我命运感到不可把握,将之托付给佛陀以获得庇佑,以躲避、回避不自信之后的焦虑。

4.对疾病的担忧。很多题记提到愿得到神灵的庇护,解除疾病的痛苦等,这也是人们对生命的留恋,希望在幻世中过得平安,实现个体相对自由的愿望表达。这些愿望完全背离了佛教的人生虚幻、人生为苦的观念。从深层上说,它是世俗的、传统的,是传统文化对佛教的逆向影响,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具体体现。比如,怀孕对妇女来说,是生命的延续,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这样的内容,在石窟文中也有表现,如“清信女佛弟子□示娠”^[2],为怀孕造像并题记,是佛教民俗化的表现。

以上发愿,归根到底是要解脱眼前的幻象,通过个体的皈依、觉悟,以躲避精神的深渊,从而实现个体自由。从这点出发,所有指归都是要超越现实,进入理想的彼岸,用未来的美好来否决现实,进而阐释空的思想。

(三)对理想的憧憬

佛教否定现实,但从否定个体的生命,而且还强化个体生命的独立意味。它用形而上的办法,给人们设计一个虚无缥

缈的美好未来,把后生命对灵魂的安慰,提前支付给苦难的人生,作为对现世人生缺憾的补偿,求得与现实的平衡。这种消极的意念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广,更容易为下级阶层接受,影响到他们的所有行为,形成群体意识和社会现象。

1.舍财建像。佛教提倡建石窟以建功德。用强调形式来证明内容的存在。通过形式强化宗教功能。所以在石窟文中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造像者近乎歇斯底里地拿出积蓄,“辄罄家财”建窟造像,以此获取相应的功德。这反映了社会功利与理想学说的交换,反映了民间宗教的世俗化特色。

2.念经持戒。石窟文中还反映出念经持戒对个体行为的严厉规范与约束。“弟子生生尚得出家”、“所称名礼敬善求成”^[2],通过念经、听经、斋戒、法会等行为实现与社会的和谐与平等,求得安慰。

3.心灵自我惩罚。宗教为了对现实人生进行否定,往往促使人们自我惩罚和自虐。把很多细小的过错,通过心灵的放大转化成原罪。通过对原罪的消解和忏悔,实现心灵的平衡。

4.主动承担痛苦。北魏朝普遍的悲苦意识在佛教人生为苦理念的推波助澜下,在石窟文中留下非常明显的痕迹。这种意识进一步扩大,使人们往往把不相干的担忧也强化固定下来,由自己承担、消解。发愿人不仅将自己对父母的责任担当下来,而且将这种责任无限地扩大,推之于七世父母、师僧长辈、同道之人、有形之类,将众人之幸福与未来,由自己的苦志来实现。这也是以前文学所没有过的。

5.对极乐世界的幻想。开窟造像最终的目的是得到极大的回报,永恒理想就是死后能“胜游无碍之境”,“若存托生,生于天上诸佛之所,若生世界妙乐自在之处。若有苦累,即令解脱,三途恶道永绝”^[2]。佛教运用唯心抽象的哲学理念,彻底混淆了现实与未来、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使人性、人情在虚妄中迷失。正是由于这种迷失,人们对现实的苦痛能淡然视之,泰然处之,进而获取莫大的精神安慰。可以说,石窟文中体现的集体情绪是:痛苦并欢乐着!且欢乐之情远远大于悲苦之情。

(四)漠视个体与社会共同意识的噤声

石窟文中共同的思想还体现在对个体的漠视上。虽然也有个体的超脱发愿内容,但整体上表现为一种集体意识,并且这种集体思想和意识的实现是有选择性的。有关国家、社会构架等问题,所有发愿人都不愿过多的涉及。他们回避现实矛盾,从不抨击现实,石窟完全成为第三空间,与整个社会割裂开来。在那里,我们看不到现实的矛盾,听不到对政治的评价,表现为集体意识的噤声。这不能不说是思想停滞的反映,是文化发展之反动。

(五)世俗化主题倾向

石窟文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特征是世俗化。由于石窟文是社会各阶层所为,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情感和微妙心理,其形象之处远胜过所有北魏史料的记载与描述,是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画卷。

1.忠孝观念的写实。石窟文虽说是宗教作品的附属物,但绝不是纯粹的宗教作品,它真实地反映着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儒家君臣伦理的礼乐观念。许多石窟文在发愿目的中一再表示是为皇帝、国祚而建,之中虽有应景之作,但更多的是时代真实情感的表露。几乎所有的发愿都围绕家庭、亲人而抒

发,体现出强烈的伦理观念,代表了时代共有之情。

2.游离的视野看社会。所有的发愿目的,很少提到自己,多为皇帝、师僧、父母、兄弟、一切眷属、一切生灵而祈求福祚,更多推及所有有生有形的生灵,表现出极大的博爱、慈悲之情。发愿人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看待世界,游离于被福报的对象,游离于社会之外。这种立场、视野,首先来自佛教觉悟意识,往往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莲花台上,以慈悲之情为亲者尊者发愿。这点恰恰是佛教人生矛盾的反映。作为佛教产物,现实中一切皆为假象,不该有情,而应持无情。然而,石窟文所表现的俗家之情、社会之情、血缘之情、人性之情,使无情世界有真情,无情宗教有人情。有情与无情的融合,虚幻与实在的碰撞,越发使得感情更为炽烈、执著、深沉。

二、石窟碑记文的美学特点

石窟文为北魏文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在艺术上独具特点,体现了宗教情绪下的文学审美趣味。

(一)凝重肃穆的美学理念

石窟文在时代浓重的宗教情绪指导下,追求沉郁、肃穆、庄重的格调,充溢着静谧、深厚的情绪。这种情绪来源于佛教脱世理念的感染与强化,自觉地对现实的“实我”进行极大压缩,其结果使丰富的情感经过庄严的熔铸表现为真情单一,使多重复杂的心理活动经过意念的整合转换成模式语言。这种宗教式的模式语言把情感与心理的极致概括为他情表露,用以表达或激发世俗的同情感。在形式上,则是把个体的不可捉摸、玄幻的思想、精神、涵养、气质等物质化,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碑记语言显示。石窟文中有敬仰之心,有宗教之情,在表象之下隐藏着供养人强烈的敬仰意识。这种敬仰意识以一种对生命存在的无比渴望,对幸福安宁的无比祈求,对死亡的巨大畏惧,通过虔诚的愿望表达、倾情的言语表述,进而寻求在佛国世界里得到心灵的慰藉与不同凡响的思想启发。如“生生世世传玄劫千佛,发善恶心,弥勒三会,愿登初首,一时成佛”;“愿修福日进,正念无退,含生有识,同归斯泽”;“托生西方妙乐国土,值佛闻法见弥世勒,一切有形,皆同斯福”;“法界含生同生兜率面奉弥勒”等^[2],尽皆模式语。

(二)典雅古朴的审美意趣

石窟文是造像的附着部分,一般安排在次要位置,多刻在边缘、下方的空处。因此在篇幅、句式上力求简短,表现在形式上也刻求古拙。语言极其精练,类似上古文写法,更多通过画龙点睛式的笔法,借助佛典意象的神秘与神圣来表现敬畏、宁静的意蕴;句式上,意句成段,错落有致,带有金文、简牍的特点,各句之间形成层次上的跳跃与过渡,使行文布局在视觉与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对比,造成典雅古朴的审美意趣。

(三)神奇华丽的文学意象

作为宗教世俗化的具体体现,铭文发挥着佛教想象奇特的特点,在无滞碍创作理念指导下,大量采用、化用佛典意象,着力刻画出非同寻常的意境,展现出生动、华丽的风范。它打破传统文学作品重视物象反映的特点,表现出超自然、超现实的意趣。“进不值鸢岭初轩,退未遇龙华宝驾。而不豫殖微因,心存祈(宝)向,何以拔此昏疆,远邀三会”^[2]。其中“鸢岭初

轩、龙华宝驾、拔此昏疆、远邀三会”等意象,全部来自佛典,排列于此,形成神奇、虚渺、玄远的美感。

(四)飞扬飘逸的行文特点

石窟文的落脚点在于对理想的憧憬。而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憧憬,是供养人普遍的、相同的心理状态与情感状态,这种状态传导为思想冲动,极大地刺激着文学的再创造能力。于是,在文章中,往往有极不可思议的飞扬与飘逸。郦道元《水经注》在描写云冈石窟状况时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恒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3]这种艺术家发自内心的赞美之情,肯定了艺术创造的魅力。石窟文多依托这种创造进行情感的抒发,往往突破宗教意念的束缚,突破传统世俗文学的规范,从浓重的宗教情绪中,开辟一个新奇的天地,体现出令人赏心悦目的外在形态与美好的审美特点,使人们在巡礼观照中寻找情感的依附,获得慈悲与同情的安慰以及永恒无限的精神。如“淡若智海,旷矣无源。尘累消亡,灵智独存。泯然一相,愍彼重昏。先欢后宝,化尽有缘。娑罗愿曜,息迹入真”,语意跳宕,超凡入胜。

(五)纯净的文风

石窟文深得佛教理念之精髓,尽可能摒弃世俗烟火之气,转向隽永的追求,使文风呈现纯净之气。这种纯净,来源于佛教的虚静,带有空幻无碍的感觉。如:“惠乐旦沦俗苦,晚悟法津。蒙北海大王落发入道,表里催济,无忘夙霄。今率贫资以申前志,谨造像一区,托宣三宝,果庶几永钟北海,群生动植,各各至音,亲识存亡普沾其趣。”^[2]发语朴实诚恳,平实之中透出极深的情感,宛如家常话语,自然口吻。《虎头寺造像记》中“而乃北山东翼岩,自天奇扶余,□□陵清霄而垂悬堂侧,峻嶒四开妙室……”^[4]语言精练准确,扬尽丽彩,如山水小记。这些写法,一改前朝文章之风,给人们开辟了新的想象天地,取得了超奇空阔、匪夷所思的效果。

石窟文是有史以来真正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学。北魏朝,伴随着造像活动,出现了大量的碑记,这是前代未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形式彻底打破了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领域文学形式的控制与垄断。以石窟文为标志,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那就是全民文学运动的出现与形成。如果从文化发展进步观点看,对石窟文价值的评价怎么高都不为过。

参考文献:

- [1]殷宪.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及其书法[J].艺术评论,2008,(4):74—46.
- [2]刘景龙,李玉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 [3]杨守敬.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4]贺玉萍.虎头寺义邑造像的文化特征及其他[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6):12—15.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